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梁 工 卢龙光 主编

圣经解读



梁 工 等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卷二 / 圣经 / 旧约

圣经旧约

卷二 / 圣经 / 旧约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梁 工 卢龙光 主编

圣经解读

梁 工 等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解读/梁 工等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0

ISBN 7-80123-567-3

I. 圣... II. 梁... III. 圣经-通俗读物 IV. B97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909 号

圣经解读

梁 工 等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伟达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1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80123-567-3/B·188

定 价: 18.00 元

执 笔 人

梁 工——导言、第二章,加工改定全书

李 蕾——第一章

程小娟——第三章

李忠敏——第四章

岳国法——第五章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总序

梁 工 卢龙光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有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是“经典宗教”，因为这三种宗教都有一部被称为“神圣经典”的圣经。犹太教的圣经基本上是基督教圣经中称为《旧约》的部分；基督教的圣经除《旧约》外还包括《新约》部分。伊斯兰教的圣经又名《古兰经》，其中不少人物源于犹太教圣经和基督教的《新约》。

这三本圣经不但有一部分内容及人物相同，而且都出自中东地区，源于亚伯拉罕的传统；其作者都相信宇宙间只有独一之神，并称其圣经有固定的文本，内容不能添加也不能减少。^①这三大宗教对圣经的基本理解是“上帝之言”，^②即其中记载了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凡人的语言。这三种宗教都认为，上帝是一个自有永存的生命，既不需要被人证明，亦不能被人找到，而是他主动透过不同的形式向人说话，即藉梦境、先知、自然界及历史事件等向人显明。对于基督教来说，上帝更是亲自进入历史，道成为肉身，在时间、空间、人群中活生生地向人显出真理和生命的真谛来，此即“上帝的话语”成为圣子耶稣向人启示。由此，这三大



宗教不但都被称为“经典的宗教”，更被称为“启示性宗教”。相对而言，其他宗教都注重人的经验、顿悟和自我寻索，是人追寻生命与神圣的结果，不可能以固定的文本为圣经。只消稍微数算一下佛经和道藏的浩瀚数目（况且还能继续增加），便可知晓个中的差别。

对基督教来说，上帝的伟大与智能是不能被有限的人所全面认识的。人只能透过上帝对人的启示去认识他，一方面透过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历史和文化去认识，此即“自然启示”或“普遍性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另一方面透过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由特定人物写成的圣经去认识，这是所谓的“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③由于“自然启示”须经“特殊启示”的解释才有价值，圣经的启示便是基督教信仰、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权威，也是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从信仰及神学的角度看，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从现实的角度说，它只是一本由人写成的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套”66卷（天主教、东正教的卷数较多些）连在一起的书，这就是拉丁文“*ta biblia*”及英文“*bible*”的含义。公元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克利索斯顿以拉丁文阴性单数名词 *Biblia* 指称圣经，意思是“惟一的书”，从此 *Biblia* 或 *The Bible* 便成为基督教经典的专称。^④

任何接触过基督教圣经的人都会发现，这部经典分为《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两部分。何以如此？关键词是“约”。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与人“立约”并且“守约”的上帝。^⑤据圣经的首卷《创世记》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将管理世界的责任交给（创1:26-28），赐予人自由意志可作各样的选择，只是约定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7）。而人的

始祖选择叛逆上帝，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上帝便按照约定的结果执行，使人的始祖痛失乐园，肉身“归于尘土”。但后来上帝又与人重新立约，圣经分别记载了挪亚之约（创 6: 18 - 22; 8: 20 - 9: 17）、亚伯拉罕之约（创 12: 1 - 3, 15, 17; 22: 15 - 18）、摩西之约（出 19 - 20; 24: 1 - 8; 31: 12 - 18）、大卫之约（撒下 7），以及先知耶利米所论的新约（耶 31: 31 - 34）。

“新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出埃及时与上帝所立的“摩西之约”，必须另立新约。旧约与新约的不同之处在于，旧约的律法写在石版上，而新约的律法写在心版上；相同之处是“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耶 31: 33）。根据这个应许，耶稣开启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强调内心超过外表对神人之约的忠诚，称义是凭着信心而非单凭可见的行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像旧约时代立约时献祭的祭牲，但耶稣一次牺牲立下新约（林前 11: 25; 路 22: 20）就永远有效（来 9: 11 - 28）。因此圣经中的《旧约》是指耶稣以前的书卷，也就是犹太人的经典，而《新约》则指成于由耶稣开创之新时代的书卷，包括记载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以及耶稣的跟随者所写关于他们如何延续耶稣使命的《使徒行传》及书信等。

圣经虽是“上帝的话语”，却透过人在历史中的经历领受，并由人所书写。《旧约》的 39 卷书共 929 章，所涉历史时段超过 1500 年（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400 年），传统主张的作者超过 20 位，如摩西、大卫、所罗门、诸先知、以斯拉、尼希米等。但《诗篇》中的许多诗歌作者不详。即使传统认为是摩西写成的五经，其内容包括了摩西去世的情况，肯定也有部分章节非摩西本人所写。《新约》的 27 卷书共 260 章，涉及的历史时段较短，大约只有 80 年左右（公元 1 世纪 40



年代至2世纪初),传统认定的作者起码有8位,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雅各、彼得和犹大。事实上书写《约翰福音》与“约翰书信”和《启示录》的约翰很可能非同一人。而13卷保罗书信中只有7卷被大部分学者同意出自保罗,其他6卷则被认为来自保罗的跟随者。^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详,从其内容可见是一个与犹太教关系密切的基督信仰者。《旧约》的作者可能全部是犹太人,《新约》的作者大部分也是犹太人,但《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出自同一人)和《约翰福音》的作者则可能是外邦人。其实,圣经的重要性或其被尊为神圣基本上与作者无涉,而是由于其内容被当时的人所重视和接受,视为源自上帝。

据圣经学者研究,《旧约》的主要经卷皆源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经过一段时期流传才成为文字;即使成为文字后,最初也非完整的书,而是又经过一段时间编辑修订,才形成卷籍。故强调某卷书是那个作者所写,只是一种现代观念;该卷书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可能与那位被命名的作者有关,以至认识他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验对理解该卷书会有所助益。但还有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即认识与那卷书形成有关的信仰群体,因为他们的经验与该卷书的内容肯定发生过互动关系,以致那卷书产生了意义而被不断地诵读、解释与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经卷包含了特定信仰群体的经验,故此认识他们的历史处境与经验,对后人了解该经卷非常重要。

《新约》所涉及的历史虽然很短,四卷福音书亦同样经历过信仰群体口头传递,写成文字,再编辑修订,形成定本的过程。而对四卷福音书进行比较时,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看出传递及保存其信息及文字的信仰群体对耶稣言行的不同经验和看法。它们能出现在同一本圣经之内,则表

现出一种多元而统一的关系。^⑦从信仰及神学的角度说,统一性是同一位上帝主动向人启示的结果;多元性则来自不同时间、空间的人对同一真理的不同体验与响应。

基督教被称为“一本书的宗教”,^⑧若离开这本书即圣经,就会不复存在。所以圣经是基督教的基础;研究圣经是研究基督教的基础。圣经研究在西方已进行了两千年,所涉范围及所用方法非常广泛;所涉的学问也多种多样,包括考古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历代学者研究圣经文本内含的意思(the meaning within the text)、文本背后的意思(the meaning behind the text),也研究文本面向的世界(the world in front of the text)。后者特指圣经对现代读者的意义除了可透过不同学科如文学或社会学来解释外,亦可从读者的观点及其身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读者对圣经的回应来观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圣经诠释在不同时代、地域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源源涌现,早已酿成一门蔚为壮观的大学问。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许多学者投身于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研究,而他们大都来自哲学系及历史系,是在原先的学术基础上转而研究宗教的,其中不少人关注的乃是基督教思想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他们借助研读一些西方神学著作来讨论宗教问题,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尚未摆脱“自然启示”或“普遍性启示”的范畴,仍是在第二个层次从事学术活动。若想真正认识基督教,必须认识基督教的根基圣经,在“特殊启示”的范畴中进行研究;而只有圣经研究才是对基督教原始文本的研究,才是首要的基础性研究。由于圣经堪称西方文化的重大聚焦点,自80年代初期以来,“圣经类”图书在国内市场上一一直畅销不衰。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圣经故事、圣经诗歌、圣



经导读、圣经辞书等已超过一百种。这批图书传播了圣经知识，但其中不少仍停留在简单介绍层面，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人们深入了解圣经的需要。

为了使国人对圣经有更充分的了解，并推动学术界对圣经做更深入的研究，我们组织了一批内地和香港的学者、研究生合作编出这套“圣经文化解读书系”。书系由6卷构成，第一卷综述圣经形成的背景、其正典化过程、内部结构、在后世的传播和阐释，及其对后世文化的深远影响；第二卷至第六卷将圣经卷籍分成5种类型依次评述，它们是：1、律法书、叙事著作；2、诗歌书、智慧文学；3、先知书、启示文学；4、福音书；5、《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全书的理论深度和文字风格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既从基本常识谈起，又尽量体现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就和作者的研究成果，使一般读者和学者都能从中受益。语言则力求准确、简明、优美、活泼，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知识性、学术性和较高文化品位的统一。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及纪念黄传经先生之基金的赞助，特致谢忱。由于资料准备不足，学术水平欠缺，书中肤浅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诚邀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2003年3月1日

[注释]

① 见杨牧谷《Canon(正典)》，载《当代神学辞典》上册，第179-181页。

② 见《提摩太后书》3:16-7。参见周天和《“传统教导”与“圣经研究”》，载卢光编《读经、研经、释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2000，第10-18页。

③ 参见 C. H. Pinnock, 'Revelation', in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ed. Sinclair Ferguson & David Wright, Downers Grove: IVP, 1988, pp. 585 - 587.

④ 卓新平《圣经鉴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页。

⑤ 参见 F. F. Bruce, *Canon*, pp. 19 - 22.

⑥ 参见 Raymond E. Brown, *An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⑦ 参见 James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 I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 of Earliest Christianity*, 2nd ed. London: SCM, 1990.

⑧ 参见 F. F. Bruce, *The Canon of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VP, 1988, pp. 18 - 19.

导 言

圣经处于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之中。它在漫长年代和宽广地域的复杂时空背景下逐渐形成，成书后与后代文化又发生了盘根错节的内在关联。这一事实要求读者在进入圣经的文本(text)之前，必须留心观察它所依存的特定语境(context)。本书作为“圣经文化解读书系”的第一卷，试图勾画的大体便是环绕着圣经文本的文化语境。其内容大致包括圣经形成的地理环境、圣经编著者、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的成长历程、圣经卷籍获得正典地位的经过、圣经的构成及其语言和观念特征、圣经在西方和中国的传播、圣经阐释学的简史和主要方法、圣经考古学的兴起和重要成就，以及圣经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等等。

圣经的地理环境指圣经所载历史事件发生的自然环境，亦指圣经作者们生活和著述的地区。在《旧约》和《次经》时代，这一区域是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至《新约》时代，则是以巴勒斯坦为中心，包括北非、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在内的地中海东南和东北岸地区。“肥沃新月形地带”(Fertile Crescent)由美国东方学者布雷斯特的



德首先提出,用以指代中东文明的发祥地,特指从巴比伦南端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而上,经亚述向西,越过叙利亚草原,沿地中海东岸抵达巴勒斯坦南部的辽阔地区。再扩大一些,还包括埃及的尼罗河下游一带。因这一地带略呈新月形,故名。在纪元前的大约 2000 年中,古代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放牧耕作、思考并著述。公元 1 世纪基督教兴起后,耶稣的使徒为了把福音传遍天涯海角,乃冲出新月,远行至北非、小亚细亚、地中海岛屿和南部欧洲。

约当公元前 20 世纪或稍后不久,犹太人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携家族向迦南迁徙,揭开犹太民族史的帷幕。其后,历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长徙居时期;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时期;约书亚攻占迦南和士师秉政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创建统一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分立及相继沦亡时期;囚居于巴比伦和回归故乡、复兴故国时期;以及反抗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的宗教迫害及政治压迫时期。这个灾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最终在公元 1、2 世纪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园,被迫漂流于五洲四海。而当犹太民族陷于背井离乡的惨剧中时,公元 1 世纪 30 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稣创建的基督教从其犹太教母体中娩出。自 40 年代起向西亚北非南欧的辽阔地带广传福音,以星火燎原之势取代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于公元 4 世纪被接纳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在上述时空环境中,随着各种早期文本历经千余年的沉积、筛选、整理和编修而渐成经典,圣经的正典化过程逐步完成。一般认为,《旧约》的律法书形成于公元前 5 世纪末,先知书形成于公元前 3 世纪末,圣书卷形成于公元 1 世纪末——这也是全部《旧约》完成正典化的年代。《新约》各卷的写作介于公元 1 世纪 40 年代至 2 世纪上半叶之间,正

典化过程则延伸至4世纪上半叶。而圣经正典一旦形成,其经卷构成、外在语言和内在观念就以不可替代的样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世一成不变的研读对象。

为了把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介绍给世界其他民族,必须进行语言转换即翻译工作。事实上,两千年来基督教的传播史首先便是一部圣经翻译史。随着基督教流传的范围不断扩大,圣经译本的语种和版本也日益增多。据联合圣经公会提供的资料,时至21世纪初,圣经(或其部分卷籍)译成的语言已达两千多种。在一些文化落后民族,早期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是在译经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最早的书面文化成果就是圣经中的章节。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思想家反对罗马教廷的一条重要战线是翻译和出版圣经。由于各种民族语言译本动摇了《拉丁文通俗译本》(即《武加大译本》)的独尊地位,翻译者们遭到宗教法庭的残酷迫害,有的被追捕,有的被送上火刑柱。20世纪以后,不同类型的新译本层出不穷,既有利于普及的浅显文字本和意译本,也有用于研究的详尽注释本和资料汇编本。考虑到我国读者对圣经传播的情况缺乏了解,本书辟专章介绍了圣经在西方和中国的流传,不但述及人们通常提到的英文译本,还比较详尽地谈论了历代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以及瑞典文、丹麦文、冰岛文等圣经译本的情况。对中文圣经翻译,则从源头写起,依次谈到唐代的景教译经、各时期的天主教译经、基督新教的文言文译本、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和合译本、汉语方言译本,以及现代华人译本。

作为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元典,圣经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库。但开采其资源离不开解读或诠释。早在公元1世纪,耶稣对律法书和《诗篇》就率先进行过灵活变通



的解释。两千年来,研究这部经典的学者、流派、理论、方法和著述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从古代强调寓意解经法的亚历山大学派、坚持字面直解原则的安提阿学派,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直至近现代的马丁·路德、加尔文、施特劳斯、威尔豪森、哈那克和巴特等,他们的著述能汇成一个庞大的圣经图书馆。18世纪以前,圣经研究主要在教会内部进行,目的是阐发神学教义,为宗教信仰服务。18世纪以后,受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和科学实证精神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研究者涉足这片领地,把圣经作为古代史上的文化典籍来考察;大批教内学者也以历史的目光和求实的态度重新审视这部经典,以利于教会与时俱进地调整方略,积极回应现代社会不断提出的挑战。古今学者在阐释圣经过程中归纳出多种研究方法,诸如字面解经法、隐喻解经法、预表解经法、合理化解经法、化除神话法、经文考证、历史考证、文学考证、传说考证、编修考证、叙事学与读者反应评鉴、社会学评鉴、女性主义及解放神学诠释、亚洲处境诠释等,本书对它们的概况作了说明。

18世纪末叶以来,圣经考古学异军突起。这是一门依据“肥沃新月形地带”的古代遗迹及出土文物研究圣经、恢复其历史原貌的学问,肇始于17世纪,最初挖掘出的古玩、雕像等只用来装饰房屋、美化宫殿,或作为出土艺术品而收藏。1798年,拿破仑的远征埃及部队在尼罗河谷发现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20多年后研究者依据该碑释读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使尼罗河流域的古文化宝藏门户大开,圣经考古学亦深得其惠而硕果不断。整个19世纪,圣经考古学接连取得重要实绩,如罗林逊(H. C. Raulinson)发现的贝希斯敦碑铭(Behistun Inscription),博塔(P. E. Botta)发掘出的尼尼微城遗址和亚述王宫,蒂申多夫(C. Tishendorf)发现

的希腊文圣经“西奈抄本”，沃伦（C. Warren）找到的希律圣殿根基和耶路撒冷秘密水道，克莱蒙·加诺（Clermont Ganneau）发现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史密斯（G. Smith）从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发现的“洪水泥板”等。20 世纪上半叶，圣经考古学界又连创佳绩，《汉谟拉比法典》，象岛蒲草纸卷（Elephantine Papyri），波格斯凯泥板（Boghazkoy Tablets），吾珥废墟、乌加里特文献（Ugarit Texts），努斯泥板（Nuzi Tablets），马里文献（Mari Texts），拉吉信件（Lachish Letters）等相继出土。20 世纪中期，被誉为“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就”的“死海古卷”陆续问世，震动了整个西方学术界。自 1947 至 1956 年，考古学家从死海岸边库姆兰山区的 11 个洞穴中找到大约 600 份手抄经卷和数以万计的残篇，其中包括《旧约》多数经卷和《次经》、“伪经”个别卷籍的古代抄本，以及库姆兰社团的各种文献，它们对校订《旧约》原文，研究古代后期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的历史具有十分重大的文献价值。20 世纪下半叶，圣经考古学依然方兴未艾，新的考察和发现接连不断。

至于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无论就其广度或深度而言都是一言难尽的。在西方国家，由于拥有历代的无数读者，圣经的影响力已渗透哲学、道德、伦理、法律、政治、文学、史学、美术、雕刻、建筑、音乐、民俗……乃至包括结婚生子、饮食起居在内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圣经对东方国家也发生了日渐显著的影响。在中国，圣经中的平等观念和民主思想程度不等地启迪过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官话和合译本”滋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代作家。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评介、研究圣经的论文和专著逐渐多起来，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圣经的课程，甚至设立攻读